

竺可桢 国立浙江大学年谱

(1936—1949)

李杭春 著

竺可桢 国立浙江大学年谱

(1936—1949)

李杭春 著

浙江
大学
出版
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1936—1949 / 李杭春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5
ISBN 978-7-308-16898-4

I. ①竺… II. ①李… III. ①竺可桢(1890—1974)
—生平事迹 ②浙江大学—校史—1936—1949 IV.
①K826.14②G649.28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7498号

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1936—1949)

李杭春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责任校对 胡 畔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50千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898-4

定 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bs.tmall.com>



竺可桢 (1890—1974)

序 一

田正平

说来惭愧，作为一名教育史从业者，我真正关注并认真研读我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先生的教育思想和著作大致是2007年以后才开始的。当时，我正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学术兴趣，制订了一个所谓的十年计划，准备用大约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阅读和研究一批清末民初的士人日记，藉以丰富对那一时期社会变革、教育变革所引发的士人心态变化的理解，从而加深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心理层面的认识。出于这样一种目的，尽可能地收集各地整理出版的日记类文献，从晚清四大著名日记，到乡村士子刘大鹏、朱峙三的日记，从黄炎培、胡适、吴宓的日记，到恽毓鼎、张謇、吴汝伦的日记，只要得到有关信息，总是千方百计购置。在此前后，已大致浏览过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五卷本《竺可桢日记》，这个五卷本由于是“摘编”，所以读起来总是觉得有点不满足，关键时刻常常被省略号所打断。正在此时，看到了由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从2004年开始陆续出版的《竺可桢全集》。从“前言”中得知，《全集》的6—19卷将全文收录竺可桢1936年至1974年的全部日记，于是，生活中多了一份期盼，出版一卷购置一卷，终于在2013年把已出版的24卷购齐。

当时刚刚结束了《胡适留学日记》的研读。在1915年1月20日的日记里，胡适记下了他在哈佛大学与竺可桢、张子高、郑莱等同学的一次聚会，聚会讨论的主题是“设国立大学以救今日国中学者无求高等学问之地之失”的问题。这次聚会由竺可桢作东，当时的竺可桢和胡适他们只是一群20岁出头的大学生或研究生。一月的波士顿，室外寒气逼人，室内却热气腾腾，“畅谈极欢”。这样一幅图景，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我决定调整计划，接下来重读《竺可桢日记》，先从1936—1949年这一段读起，因为这是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校政的13年，也是他全面实现自己20多年前理想抱负的一个重要时期。反复捧读这些70多年前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在昏暗摇曳的煤油灯下写下的数百万言《日记》，真的让我非常感动。在那段日子里，我经常与同事和学生们谈起，阅读竺可桢校长的日记让人有一种接受精神洗礼的感觉，有一种精神境界升华的震撼。深刻地感受到，正是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浙江大学经历了千辛万苦的“西迁”，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空前民族灾难中，实现了由一所地方性大学跻身于中国著名大学的关键性一步。可以说，浙江大学在成长与发展进程中的最重要时期，正是在竺可桢长校期间经历的。

另一方面，在阅读这些日记和研究竺可桢教育、科技活动及其思想时，总感到有些遗憾，即是觉得像竺可桢这样一位科学界、教育界的巨擘，一位在国内外交游广泛、影响巨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现有的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料的积累真的是远远不够，与他的地位和影响太不相符。别的不说，据我粗浅的了解，迄今为止，除了李玉海先生的《竺可桢简谱》，还没有见到其他更翔实的“竺可桢年谱”。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对于人物研究而言，一部翔实可靠的年谱是多么重要，说得极端点，几乎就是一种

必备的工具书。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各种版本的年谱，何止一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些著名教育家如蔡元培、张伯苓、叶圣陶等，都有了数百万言的年谱长编；胡颂平编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早在1984年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煌煌十卷，更是一部享誉海内外的巨著。这些年谱和年谱长编的编辑出版，无疑对推动有关谱主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在研读《竺可桢日记》时，每每有一种冲动和期盼，如果能在《竺可桢日记》的基础上，参考其它史料文献，下功夫编辑整理一部《竺可桢年谱》，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说来凑巧，2016年12月，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李杭春老师送给我一部《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打印稿，说是让我提些意见。书稿拿到手后，我用了两天时间即把20余万字的稿子读完。一个最直观的感觉即是，这部书稿使我近些年来阅读《竺可桢日记》所获得的一些感想、印象和留存下来的一些疑问一下子清晰起来、连贯起来、丰满起来。这可能正是一部翔实的年谱之于人物研究所发挥的作用。读了《后记》我才知道，这部书稿完全是作者利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完成的：“这是一个‘四无’产品：年谱编撰者一无学历，二无职称，三无课题，四无时间。”说是无学历、没资质，实在是过谦之词，作者1994年即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获得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差不多十年之前就参与编纂了12卷本的《郁达夫全集》和两部郁达夫研究资料。后面的“三无”却是实实在在的。凡是在高校工作的同志都清楚，在目前的学术生态环境中，没有高级职称、没有纵向或横向课题、没有经费状态下从事科研工作是个什么滋味。但是，作者却认为：“其实，除开时间是个硬伤，惟透支生命别无他法；其他的，对于一个人文学者，应该都是浮云。尤其是每一个字都靠自己敲打，每一条信息都由自己掌握，每一句表述都经过自己的思考，

这样做，无论如何都让我欣慰，让我心安。”说得真好，我相信这不是无可奈何式的自我安慰，而是一种对学术研究本质的理解和认知。顺便说说，我认为，破除多年来对“三有”的盲目和追捧，摆脱“三无”的桎梏和束缚，应该是改造当前高校学术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并不是—部完全意义上的《竺可桢年谱》，与—般的年谱类著述不大—样，书稿定名为《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把谱主与—所他曾经工作过的大学放在—起考察，上自1936年1月，下迄1949年12月，以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校政的时间为始终，蕴涵着作者的深意。应该说，浙江大学的这段经历，不仅在其自身百年发展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笔，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启示，其中的—个重要启示即是，—所地方性大学或者说—所普通大学，如何在—位校长的带领下，审时度势、努力处理好学校发展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重大关系，抓住时机、乘势而上。当年的浙江大学当然远远谈不上是世界—流，但是，基于—所大学的发展所体现出来的这些经验，折射的是现代大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发展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和她的主持者必需具备的基本素质。今天，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国高等教育的面貌，与70年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能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而现代大学赖以生存的中国这块土地的历史文化血脉，在我看来似乎也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对于我们学习、理解、研究竺可桢的办学理念、思想境界和个人情操，对于我们继承、发扬、光大浙江大学的“求是”传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最近几年，教育界、特别是高等教育界在探讨创建世界—流大学的过程中借鉴西方现代大学的治理经验提出很多极好的建议和设想。诸如办学理念、制度建设、组织构架、知识生产，大学与外部关系的处理，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所有这些好的设

计和制度都是要靠人即大学校长来执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大学校长这一角色的特定涵义还关注不够。我常常在想，和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他们那一代人当校长的时代相比，我们当代高等教育缺乏的难道仅仅是完善而宽松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制度吗？恐怕未必，可能更缺乏的是一批有高尚远大的办学理念，有只问是非、不计个人利害的崇高境界，有清正廉洁、襟怀广阔的个人情操的大学校长，这很可能是一个许多人心知肚明而大家又都不愿意挑破的话题。在这方面，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榜样，我们应该珍视并善待这份精神遗产。

我期待着作者能在这部《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的基础上，往前追溯，往后延伸，把这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做下去，下个三年五年功夫，编撰出一部内容更加全面、资料更加翔实的《竺可桢年谱》。事实上，竺可桢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已 46 岁，卸任浙江大学校长时也才 59 岁，除此之外，他早年的学习、生活经历，他留学美国期间的学业、见闻，他回国后从 1918 至 1936 年期间的研究与教学生活、广泛的社会交往，以及 1949 年后他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任内 24 年的风风雨雨，可以说，他的一生参与和见证了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竺可桢不仅是浙江大学永远值得怀念和敬仰的一位校长，他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现代中国大学校长、现代中国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成长、中国当代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从他的身上、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汲取营养，获得精神和力量！

是为序。

丁酉年岁初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序 二

王作跃

2016年12月我有幸到浙江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与师生讨论我多年来从科学史角度研究浙大老校长竺可桢对中国科学和教育发展所作的贡献，获益匪浅。也就是在这次学术活动中我认识了浙大校史研究者李杭春女士，并承她赠送她所编著的《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初稿，读后深为她细致求真的研究精神和竺可桢浙大坎坷辉煌的历程所感佩，所以当杭春邀请我为书作序，我欣喜从命。

从庚款留美到中国科学社，从东南大学到浙江大学，从中央研究院到中国科学院，竺可桢是第一代中国现代科学家、科学组织者和教育家的杰出代表。1936—1949年他担任浙大校长，恰逢八年全面抗战和四年国共内战，是浙大乃至中国近代史上最艰难困苦的一个时代。作为中国气象学和地理学奠基人之一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在到浙大之前本来是充满抱负要在科学研究和中国气象事业上大有作为的，但主要出于对社会的责任心，他接任了浙大校长。后来他虽一再请辞但最后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导航浙大13年，使其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最优秀大学之一，集中了王淦昌、苏步青、谈家桢等一大批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到校任教，培养了一届又一届有成就又有担当的毕业生。我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科学院读硕

士学位的导师、杰出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许良英和范岱年先生就是竺可桢任浙大校长期间的物理系毕业生，并终身受其影响。

从这本《年谱》可以看出，尽管竺可桢视执掌浙大为个人的必要牺牲，但同时也把这看作一个机会，试图通过融合中西文化的精髓理念来改造中国的教育和社会。这些理念里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为浙大所定下的著名的“求是”校训（1938年11月19日）。求是之含义，他曾引用中国明代思想家王守仁（号阳明）之语来阐明：“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1939年7月16日浙大毕业典礼）。这说明他所强调的是独立、创新、牺牲精神，而这与他上过的哈佛大学的“真理”校训相一致（《竺可桢全集》第三卷第89页）。

求是精神之所以能在浙大深入人心，不仅是由于竺可桢不断的倡导，更是因为他自己的身体力行。《年谱》以大量细节详细记录了抗战中浙大艰苦卓绝的西迁过程，并显示出学校不仅能度过难关，甚至能百折不挠，提升学术，以至于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1944年到华访问时曾发出“〔西南〕联大、浙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之语（1944年12月16日）。而这些成就与竺可桢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牺牲自我密切相关。1938年夏，在竺可桢为学校西迁远行操劳之时，次子竺衡和夫人张侠魂在颠簸流离中相继染病去世，不能不说是竺可桢为浙大所作出的巨大牺牲的一部分。

除了秉持“求是”之外，竺可桢还力图以民主、自由理念办学。1945年他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所举办的战后教育座谈会上曾明确提出“主张学术自由，反对标准化办学”（1945年4月1日）。稍后他又公开主张“政党一律退出学校”（1945年4月23日），“学生政党信仰完全自由”（1946年1月11日）。在国民党政府因为浙大学生组织抗议活动而对学校施压时，竺可桢坚定回应：“浙大向来事事公开，开除学生须有理由。且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

开除之”（1948年2月16日），并屡次不惜以辞职来捍卫学校的自主权。在学校管理上竺可桢则尽量采用民主的教授治校方法。例如，在1945年间相继设立主要由教授组成的教员升格委员会、建筑委员会、经济稽核委员会、预算委员会，来决定学校大政方针，并利用行政谈话会和校务委员会主持日常校务（1945年6月1日）。另外，对学生，竺可桢一再强调要有专业精神和服务社会的态度。对学校的学科分配、机构设置、方针政策，他坚持文理、现代与传统、教学和研究的兼顾。这些民主、自由、均衡的办学理念和实践使得竺可桢获得广泛赞誉，成为民国时期著名校长之一，是这段时间浙大崛起的基础，也是值得当代教育、科学机构管理者借鉴的历史经验。

读这本《年谱》，我感到杭春不仅是在记载、也是在实践竺可桢在浙大倡导的求是精神。《年谱》的编辑工作当然深深得益于近年来《竺可桢全集》的出版，尤其是其中竺可桢日记足本构成了《年谱》的主体。但杭春没有满足于此，而是广泛搜索、甄别、研究、引用其它相关资料，包括其他人的日记和年谱、浙大等档案以及旧报纸等，甚至循着当年浙大西迁的路线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地方的档案和各地的展览又收集到不少珍贵的史料，并在附录里挑选出竺可桢离开浙大以后在日记中所记载的与浙大相关的内容，为《年谱》的完整性增色不少，与《竺可桢全集》一样，体现出求真、求全的历史责任感。这本《年谱》与樊洪业、李玉海先生（《竺可桢全集》的主要编辑和功臣）所编《竺可桢的抗战年代——竺藏照片考述》（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相辅相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把两本书对照来读。

作为历史学研究者 and 读者，我感谢杭春编辑《年谱》的辛勤付出，期待看到她有更多的浙大、竺可桢优秀研究编著问世，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公众从事、关注、得益于真实历史的收集和研究。

2017年3月22日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

前 言

—

三年前开始从网上一本一本买齐《竺可桢全集》的时候，我没能预料这位气象学家的日记会带给我如此大的震撼。当初因为《马一浮全集》，发现老先生关于浙大约请国学讲座的叙事与学界基于《竺可桢日记》披露的信息不无矛盾^①，决定两部全集捉对来读，结果不由自主坠入这个浩大深邃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国立浙江大学，有关民族风云、时代更迭，更有关几代知识精英的命运浮沉。可贵的是，老校长始终以一支平和冲淡之笔，如实记录近40载，留下了逾1000万字的故事和心情，成为我们今天咀嚼、赏玩、回望和礼敬那段历史、那些岁月的最好蓝本。

老校长的文字助我完成了一系列相关话题的研究，而且自虐的是，因为多看了几遍全集，一个让人兴奋的念头在2015年暑假诞生：何不以竺可桢日记为基础，编一个“竺可桢浙大年谱”呢？既为勾勒国立浙江大学时代的竺可桢，也能厘清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

^① 参见拙作《讲学与传道——马一浮与国立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4期。

一举两得，岂不善哉！

于是，漫长的信息遴选、输入、查阅、核对，就开始了。从2015年暑假到那年年底，所有假日和工余时间几乎都被全集内外海量的材料所挤占，终于在那年的最后一天，按计划录完了竺可桢13年日记里所有我以为是的相关信息，如期搞定第一步计划；第二步，是大量翻阅和收录用于补充和辅佐的各类报刊记载史料，增补重要信息，并为其中的部分人物和事件作简注或说明；第三步，则是利用假期重走始于80年前的国立浙江大学西迁之路，探访各地档案馆、纪念馆和浙大办学遗址。

现在，这部几经磨砺的年谱已经粗具规模。在对相关档案、日记、书信、纪传和其他文献作了几番地毯式的搜寻和对各地作了相关探访之后，年谱中竺可桢和西迁时期国立浙江大学的形象，在我眼里越来越完整真切并且像昨天刚发生一样鲜活生动。这里有悲怆、沉重，有无奈、苦闷，因为伴随竺可桢和他的同事、学生们的，是战争、炮火、死亡和长时间的播迁与流浪；这里也有关怀、温暖，有豪迈、自信，因为一位意志坚定、视野前卫并理念独立的校长，国立浙江大学兀自走上了那条跻身国内一流甚至成为“东方剑桥”的征程。在我看来，这段历史充满光荣，书尽传奇，但是不可复制，尽管它像是今天众多高校使尽解数想要抵达的目标。然而，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今天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靠近她，还原她，然后怀着崇敬宝爱她。

二

依年谱之名，我们大体可以设想三个关键词：“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和“1936—1949年”，它们不同侧重的排列组合，或可提示本年谱的三大主题：

主题一，“长校国立浙大时期的竺可桢”。作为非常时期空降浙大的竺可桢，除了艰危岁月里率校西迁，非常条件下潜心办学，十三年如一日尊师爱生，全年无休任劳任怨，将一所毫不起眼的地方高校，引领成广受赞誉的“东方剑桥”……这一切自有实证随处可见；而更值得珍视者，当有他就任前的犹疑，任期内的纠结，卸任后的长怀关切，诸种复杂、真实的心理和细节，在日记里呈现得自然真切。年谱有什么理由不将这样的细节刻录下来，以助力我们对一代大学校长更真实的还原、更立体的研究呢？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东关（现属绍兴市上虞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中国物候学创始人。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庚款留美，入伊利诺依大学农学院学习，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191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秋起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8年，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4年，与翁文灏、张其昀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6年4月，在兼任气象所所长同时，竺可桢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历时十三年整。本年谱记录的就是竺可桢这十三年的风雨人生。

主题二，“竺可桢治下的国立浙江大学”。比照今天，民国高校获得的成就有目共睹。那种民主精神，科学姿态，那种独立情怀，自由思想，此番现代大学之要义在那个年代已成为众多高校和高校学人追求的目标。国立浙江大学的成长，离不开那样一个志同道合之群体、之语境，离不开对那样一种现代价值的共同体认，浙大及其同道者艰难成长的重要关节，自是年谱别一个记录重心。而竺可桢治下的国立浙江大学，因校长特为家乡的大学拈出“求是”二字作校训，倡导并力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求是文化，为浙大

的腾飞导航、护驾；因校长还为这所学校延揽了大批学人，创设了完全学科，以那个年代所可能有的超豪华“配置”，让国立浙江大学出落成民国高校之奇迹，这一切，更是年谱所在尽心描绘的。

主题三，“竺可桢浙大十三年”。这十三年是如此特殊，因为其间竟可以有十二年被战火追逐，为硝烟围困。而学校和其师生仍是如此淡定，如此从容。他们恍若远离这个世界，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诸大学职能几未受影响；他们又实实在在地身处其境，在战火硝烟中一次次经历颠沛流离，一番番感受黯然神伤。战争确乎可以摧毁掉城市、乡村，摧毁掉工厂、田园，摧毁掉如此众多的生命和文明；但是，竺可桢和他同时代人的选择告诉我们，作为人类最高理想的那部分梦想和信念，是任血雨罡风，都难以毁弃的。

三

今天回首老校长日记，我们会发现浙大的“成长”是何其艰难。

战争年代高校西迁，是非常时期民国教育部一项顶层设计。全面抗战两年之际，教育部长陈立夫曾有过一份报告，《抗战二年来之教育》，为我们记下了那个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艰辛与努力：“战事既起，军运浩繁，各沦陷地点及迫近战区之学校，于舟车供应缺乏之际，幸能抵达内地，恢复课业，西北达陕甘，西南及云贵，中部溯江而上至四川各地，往往在昔日视为交通不便，高等教育未发达地区，今皆成为学府之林，对于内地各省社会文化之演进，裨益甚巨。”

在这次漫长的迁徙中，浙江大学将“求是”文化火种播撒得最为辽远，最为广阔，几乎覆盖大半个南中国。他们求是启真的勇毅，他们海纳百川的胸襟，他们树我邦国的信念，他们天下来同的情怀，都写在这一趟前无古人的文军长征里了。

那是全面抗战爆发不久，靠近前线的国立大学中，国内显示度最高的几所高校，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基本第一时间就撤离原址。1937年10月，北大、清华、南开西迁至长沙，组建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半年以后，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成为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亦于同时一步到位抵达重庆，借址重庆大学异地开张；“朝中有人”的武汉大学也不一般，虽本就远离前线，可迟至1938年3月西迁，也是择定乐山不松手，无论如何损失都被降到了最低。但像同济、复旦（私立）和浙大这样“非主流”的东部前沿学校，西迁路程归各自规划，就相对辗转和漫长了。与浙大一样，同济大学是从上海江湾搬迁至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广西八步、云南昆明而四川李庄，复旦大学也是经江西庐山、贵州贵阳而重庆北碚，都是历尽波折。

而倘以部拨经费来衡量，当年浙大在全国高校的地位也比较尴尬。1936年，竺可桢接手浙大的一个条件，就是浙江大学每月经常费由国库拨六万元，加上省拨一万元，保证全年经常费76万元，用于支付教职员薪资、购置仪器书籍和日常办公支出等。这其中，教职员薪资会占到60%以上。当时，这个经常费数字排在武汉大学之后，更遑论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了。所幸临时费可随时申请，比如建筑费、搬迁费、外文图书费、学科增量费、借读生补助费、学生贷学金等等，名目不限，合理即可。竺可桢为浙大跑得最多的就是这类经费。

钱不多，路周折，战乱环境下，大学能维持，文化种子能存续，就已经是莫大的宽慰和贡献了。而浙大在定居遵义、湄潭后“报复性”的壮大，气象学家校长和他的团队积蓄已久的能量的厚积薄发，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全面抗战八年，国立浙江大学一跃跻身世人瞩目的杰出大学，这一切，自然跟一位领袖有关，跟一位大学的引